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中国文学史

(1)
先秦文学史

廖群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從讀書者三四年其兄弟特
其全圖知其或有成立也前年分
家時天寒大雪觀雪於池閣上
亦作竹樹時以凍不可去年春館
遂剪此留齋舍凡閱兩寒暑而後
有未盡善然而坡陀之間林疎之
物君伯時用心而替矣伯時三好畫
為之而不辭至乙未四月廿日吳郡項
觀于吳氏舍館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中国文学史

(一)

先秦文学史

廖群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岿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接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庸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中国文学流变概说

乔 力

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会自然成为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足够长的时间可能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并供我们整个民族永远怀想与受用。但是,任何事物都往往具载多重多样属性,如果就另一番意义而论,它同时又是一份很沉重的负担:你面对着这些山聚海积般汗漫无际无涯的浩繁制作,便要产生接受的困难和困惑:到底应该读什么,究竟怎样读,实际上又能读得了多少?因为局限于主客观的各种条件制约,毋庸烦言,社会及个人总难以做到巨细等差皆通盘包纳,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由是牵涉到一系列的观念和标准问题。

现今正处于新世纪伊始,在这个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分工日益细密专精、生活节奏快捷、实用功利目的强而竞争性异常激烈的工业时代,现在的中国早已远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明月青灯、细细把玩旧简故籍以穷年皓首的闲逸心境和惟求任性适意、再不复计虑效果的淡泊态度。那么,已然产生且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间步伐,仍作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自过去迈进未来、从民族走向世界,张扬永恒的美于人类心灵中?换言之,它永远是人们感性上愉悦飞扬与理

性上育导教化的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此等认识,我们编纂的这套大型文学精选书系,方始拈出这种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历代”型结构框架和精选的、由之拥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于整体上了解从远古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到最较晚近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丰富、盛极而蜕变新生的发展衍化面貌;在直觉的审美感受过程里,获取全面、系统而总握综鉴地洞悉熟谙中国文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因横向的共时性断面取舍下,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体达有关文学本体乃至某一特定文体的美学特征与艺术精神,或以其最绚丽的巅峰繁华而备具了最可能大的范型价值,或就其一定的阶段空间而显示出一定的轨迹嬗变现象。于是,它们既包容着当时的诸般社会现实的典型内涵,又未丧失现代生命活力,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荡涤,层累代积地完成了中国文学经典大厦的构建工程,千门万户,千姿百态,闪耀出永远璀璨的光芒。

再顺便说明一下的是,最初设置全书体系时,也曾考虑过采用以上古(先秦)、中古(秦汉至盛唐)、近古(中唐至清)、现代(1911年至1949年)为段落的历史分期架构方法,其本旨在于强调与内在的逻辑进程、规律变化的动态显现同步,统领相应期间的文学,而相对忽略外在历史表象的静态一致。不过,由于这样的专业界定概念还只是在学术圈子里通行,却难以被更一般性的社会读书群体所晓悉接受;况且,即分期区划的具体时限而言,学术界亦诸说并存又各持有据,至今尚聚讼纷纭而无法取得共识。是以权衡斟酌之下,最终仍然按照习惯,沿循就封建王朝兼及不同社会形态的起迄更易以标界分划的方法,来镜源流变、掣率文体,从而依次列布文学创作作品——它的明显优点是拥有有据之操作的外部凭依形式,作为一种历史的既然,稳定而清晰——另外,还需要说明,虽然文学在本质意义上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受到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等诸因素的制约影响作用；但这并非一种直接对应的等同关系，而具备相当的独立性。所以，我们这套书系也参与惯例，兼顾文学本身实际发展状况与历史上朝代更迭、社会形态演变的具体进程，将之划分为五个大阶段，以体现由简单到繁富的、从古代到现代的整体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此间宜粗不宜细，因为每个朝代更迭替兴，并不一定都能同步产生文学方面相应的变化，故而不取之为断代界标，那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一)

以下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

本书系称为《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那么，缘名求实，从古至今的诗人、作家的创作活动结晶——各类作品便自然是主体内容了。如前言者，根据其产生的时代予以历史分期，我们将之归属五个不同阶段，即古代文学的四个阶段和现代文学的一个阶段。这里先说古代文学部分。

——先秦时期为第一个阶段，这是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发轫期，或者也可以视之为第一个高潮。它的最主要特点是综合性，即兼容并包的色彩，尚未进入到自觉文学的不自觉的“前文学”。在此时，因为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还没有独立分离出来，往往混杂交织于政治、经济、宗教等等社会泛文化活动之中，使审美意识也与这些社会意识消解融会到一起，许多被后世以文学看待的作品，当时却是首先属于哲学思想的、伦理道德的、历史学术的等诸领域的著作，其中不过蕴含有十分浓厚的文学意味，拥载非常高的文学价值而已。相应于此，便是作为文学本质特征的审美愉悦功能，也自然一并被淹没在政治教化、宗教、历史等偏重实用性功能里面去了。

依据现代的文学分类观念,即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种表现样式,在先秦时期,无论胎息萌芽还是稳定成熟,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具备了。然而这种认识过分宽泛,难以作明晰的实际类别。所以,就严格意义上说,仅产生诗歌和散文两种样式,故于这第一阶段,我们这套书库中也只列《诗经楚辞选》与《先秦文选》。

至于前者的不名“先秦诗”,是缘因诗经、楚辞(主要为屈原作品,余则宋玉),无论在数量或艺术成就这两个方面,均足能代表先秦整个时期诗歌的辉煌,而共同肇端源始着这种文体几千年的流程。它们写实写心、求真求善,或再现或表现,然皆就至美至尊之楷模以泽被百世犹不绝。其外还剩存的少许逸章零篇,散见古籍中,不过片羽之光,若较之诗经、楚辞,价值、影响实有限,自宜弃置无录。而关于文,包括诂屈聱牙的《尚书》,直及诸子哲学(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与历史(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方面的制作。举凡记事记言、说理论论、抒情表意,诸般类型并见,内容题材和表达手法繁杂丰富,且混合了社会实用功能与审美功用为一体。如果将之同诗歌对读,似乎更多地体现出先秦文学“经史子集”兼容并包的综合性质及其文化特征,也更典范地体现出散文这种特定文体的自身演变发展历程。这种源于“前文学”阶段的不自觉性的杂散文观念,由此滥觞,便形成为既牢固又深远的传统,甚至在后来已经进入到文学本体意识高度觉醒成熟、很是张扬的时期,虽陆续建立起纯诗歌、小说、戏剧的体式,但主导着散文文体的,依然是兼容并包或者说无所不包的综合性倾向——有关此点,只要看看唐宋时韩、柳、欧、苏等大家复古运动的创作实践,以及历代诸多选本,如清人的《古文观止》的收录范围、取向,就十分明白它迥异于其他文体的“杂”的传统了。

——第二阶段的汉魏六朝时期,有八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是中国文学继续演变发展,由简单形态走向繁富形态,为唐宋时期的

第二次高潮准备好充分条件的有机过程。当然,此阶段的文学本身也取得非常丰硕的业绩,足可自立称雄、垂范建则;但是,如果置于某种宏观视野下,从历史的纵向流动大格局方面考察,则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的突出之处,或许正在于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及由之显现出的过渡特色。对此,不妨就文学观念的变化与文学创作实践及其载体——文学样式的多样化加以审视之。

首先谈文学观念,或者说它具象性表达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变化;大致上看,是本体意识由庞杂而趋于比较纯粹,从朦胧模糊而走向清醒条晰。汉人以“文学”概称学术性著述,以“文章”专谓文学作品,也只不过表层符号与我们现在有所不同,于实质上却已经认识到且试图区辨二者间的差异,开始透露出转变的声息。魏晋乃至南北朝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所谓的“自觉”,主要指审美意识的张扬和对形象特征、情感因素的强调。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直至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序》等等,皆一以贯之,不乏鞭辟入里的议论,揭示出对文学本质意义的深刻理解:“诗赋欲丽”、“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至如萧绎,更就汉人“文学”、“文章”的类别,进一步细分“文笔”:他以古之经籍与今之奏对等学术、实用性著作为“笔”,视古今的抒情性辞赋作品为“文”,而对“文”的具体要求是“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其间表现出来的文学的本体独立观念和自觉意识是非常成熟的了,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及艺术风气,说明从综合性的宽泛范围转变为注重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比较精细狭窄的取向。当然,受到历史承袭的传统惰性的制约影响,如果用文学的文体、功用标准衡量的话,

魏晋南北朝有些评论家，仍旧持有不同程度上的兼容并包的杂文学观念，将许多品类不符的文章也划入文学范围内。而真正严格文体意义上的、最为发达的理论，便只有诗歌一种，于其情、意、象，以及词采、风格等问题，多有深入切实的析论，被后人长期借鉴传承。

下面再说文学样式——文学创作的特定载体。较之先秦时期，这一阶段的文体分类更趋细致，也有所增益发展，故而表现的内容与手法亦更加丰富多样，相应显示了创作实践的繁荣。具体而言，本文库中计列有《汉魏六朝诗选》、《汉魏六朝文选》、《汉魏六朝赋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四种，这里将——略加阐述。

如果将唐诗比作辉煌的交响曲，那么，汉魏六朝诗便是它的精彩前奏。确实，在悠远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上，这个阶段所特别拥具的承先启后的过渡色彩，于各种文体中当首推诗歌最富典型性，并得到最充分地体现。在题材、体式、艺术方法等诸方面，汉魏六朝诗都较先秦诗有了长足进展，并为后来唐诗的极顶盛景准备好充足条件。唐代许多大诗人都受到汉魏六朝诗人的启迪影响，李白“令人长忆谢玄晖（朓）”和杜甫“清新庾开府（信），俊逸鲍参军（照）”、“焉得思如陶（渊明）谢（灵运）手”的赞叹，便可见一斑。其他如“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曹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阮籍，丰骨骏上、壮而不悲、独以“风力”称雄的左思，高蹈游仙、文体彪炳、“故称中兴第一”的郭璞……已不及一一枚举，但渊源自能清晰踪迹。尤其是它所确立的诗美观念，以及所倡扬的价值判断取向、独立的本体特征和文化品格，自“古诗十九首”、建安诗派冲破两汉的经学束缚以来，越来越形成社会共识，被更多的人重视、赞赏，是人生的某种寄托和抒发情性、吟咏自然的物化形式。

考察汉魏六朝文，则看到它综融审美、实用、学术等，大体上仍归属在兼纳多种性质与功能取向的广义的杂散文范围内。其实，

纵览全部中国散文的历程,从发轫之初直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这种情形皆通贯始终。只不过随着本体意识的觉醒强化,分类日趋严细,无论文质相副或文胜于质,写景、抒情等纯文学作品渐渐占据主流地位。另外,汉魏六朝文比其他时期文表现出较明显的异质性阶段差异,即两汉文和魏晋南北朝文的不同。

旧有“文章西汉两司马”、“唐诗晋字汉文章”一类话语,足征在各种文学样式骋胜竞彩、缤纷繁丽的中国古代文学园地里,两汉以文章来争雄称长——自然,这个“文”的观念存在着古今的迁移:以往包括了介乎散文韵文之间、骈散兼行的辞赋在内;而我们现在则专指单句散行的散文,视辞赋为独立另体——它主要由政论文和史传文两部分组成。前者如贾谊、晁错、桓宽等所写的,多属奏疏表策之类的作品,本是实用文字,辨析事理透辟、朴拙凝重而缺乏审美意趣,这当然因其功能取向所决定。后者发扬先秦历史散文的传统,虽然是遵循实录原则、强调劝惩资治精神的史籍,但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于人物形象描写、情节结构、想象夸饰因素上,显现出突出的叙事艺术特征,从而形成了兼跨两个学科领域的“边缘”性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堪称范型。以后的史书便逐渐发生变形,开始乃至完全剥离它的文学成分,走上“纯粹”的历史道路;而那些与历史分流的文学成分,则转移到小说等叙事文学类型中,迈向更光辉的未来。

魏晋南北朝文,诚可谓文学自觉意识的产物。或悲凉慷慨,气势充沛,纵横恣肆,任意挥斥;或疏爽自然,清新净简,留连顾盼,通脱闲雅,无不弥漫着浓厚的抒情味调,注重生动鲜明的形象性,旨归在审美意趣,而脱落两汉散文之杂,变为纯澄。不过,以“北朝三书”(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颜之推《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北朝散文,却继续着两汉文的实用精神,它们源流河道地理、兼及人文故事,记述古都寺庙的建毁兴衰、存一代史迹,就一己饱经丧乱、流寓北地的切身经验教训谆谆传于子孙家族,皆与重在

愉悦审美的南朝文风志趣迥异。尽管三书里也有若干生动优美、颇见文学意味的片段,但总体上究竟与严格意义中的文学作品距离甚远。

一般认为,辞赋最初兴起于战国时代的南方楚国,是一种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体。而辞和赋或许略有区别——屈原作品标志了楚辞的顶峰成就,从一开始产生便体现出完全的成熟性;宋玉、荀况赋则被视为赋体的最先尝试,尚未定型——其实也难以绝对严格分辨,所以,习惯上仍是辞赋混同联称,作整体看待。汉统一全国后,它得到广泛流传,逐渐成为文士们喜欢采用的主要文学样式。初期的骚体赋多模拟楚辞,重在抒写矢志叹慨与宫中悲怨,较为朴素。自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的接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以司马相如、杨雄、班固等为代表,是大赋的体式确立后发展到鼎盛阶段,遂推为两汉的时代文学,和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相共举称于世。它倾向于宫廷化,篇幅宏大,一派铺张排比之风,词采繁缛华美,极尽雕饰之能事。与其平行进展的体物写志赋,及至东汉后期与建安曹魏时期的赋,不仅是篇幅愈益趋于短小,且能脱弃大赋颂扬劝喻的实用功利目的,转向对社会现实和个体际遇的关注,减弱了纯客观摹写的成分,而偏注在主观抒情。两晋之际的辞赋,题材呈现多样化,南朝时期再沿此发展下去,骈偶精整的笔致也更加强了。虽说在这些不同阶段,风貌习尚并不尽一致,但总起来看,所笼罩着浓重的抒情气氛,已发展成为与前不同的特色。有的亲历祸乱、由南入北的辞赋家,作品融会南北,尤其如庾信集南北朝之大成,于深沉的史诗意味里,将之推向极致。

“小说”一语,最早似出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唐成玄英疏云:“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问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可见,此时所谓的“小说”,观念上尚未具有文体方面的规定指向意义,只不过是些琐屑浅近的言谈,与高论宏说相对举罢了。待到东汉初,桓谭

称：“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桓子新论》）班固也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并于《诸子略》所列类的十家中，将小说家缀挂末位。在这里，“小说”已经初步拥载一般性的文体含义，尽管还未臻达纯粹的文学概念，却能够包容中国古代小说萌发、新生阶段的某些理论总结了。相应地，作为其建立基础的创作实践，一些作品业已具备了若干故事情节与想像、虚构成分，尝试着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强化审美意识，注入主观情感色彩。虽然还不够成熟，甚至失之简略粗疏，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考虑将汉魏六朝时期视为文言小说的第一期，而不取先秦时期的寓言、神话之类。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作品内容有两大类：即记载鬼神怪异故事的神话传说，习称“志怪”，可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此其一。其二是“志人”类，又包括着两个方面，有接近史传体的首尾较完整的长篇和记录现实社会人物逸事佚闻的杂录性短篇，它们分别以《燕丹子》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

——唐宋时期首尾跨越六百五十余年，是为第三阶段，这中间还包括着唐宋之交的五代十国，以及长期与宋对峙并存的辽、金两个北方异族政权。就总体而言，它被视作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兴盛的时代，诸如文化艺术、科技工商业等都高度发达，直居东方各国乃至世界文明之前列。并继先秦时期的第一次高潮之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全面繁荣的第二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的高潮：其中或者像唐诗、宋词，标志出某种特定文体所可能臻达的最高成就，从而拥载着时代文学的意义，堪称后世再也无法企及的巅峰极顶；或者有唐宋之文、唐传奇小说、宋代诗歌理论，在前人已建构起的基础上，又将之推向新高潮，显示着恒久的范型价值；再者如宋人白话本小说，诚则椎轮大辂，凭其始发勃动之力，昭明了那后来无限的辉煌前程……

当然，两朝的具体情况也各具独自的特点；例如李唐帝国幅员辽阔、综合国力强大，中外文化的交流也非常频繁，是最先进、开放性最高的一个封建王朝。而盛唐与中晚唐又是中古和近古的分界，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盛唐精神充满感慨豪迈、自由向上气势，对未来抱有无限信心希望的青春热情；从中晚唐开始，便迈进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固然是多一些成熟与深沉，却也悄悄升起某种伤感迟暮气息，渗透在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及待到赵宋王朝，此等伤感迟暮情调就更沉重，再加上睿智思辨的理性色彩和闲雅悠远的风韵气度，由之构成这个阶段的特定人文精神——“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魏征《述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与“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钱惟演《木兰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鹊踏枝》），这两类唐诗宋词中的句子，再形象传神不过地显现出唐宋这两个时代于艺术精神、审美趣味、生命价值认定、文化品位等方面的差异。相较而言，两宋自立国之初在军事国势上便呈卑弱之态，后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未能阻止其积贫积弱的整体走向。尤其是与其国运伴随始终的边患严重，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西北的西夏成为困扰赵宋统治者、威胁他们政权生存的直接问题，而北、南宋最终还是覆亡于金、元异族侵略军南下杀伐的铁蹄之下。所以，宋代文学少有唐人立功边塞绝域、吞吐四宇八方的驰骤睥睨气概，而更多了些的，则为御侮图存、光复中原故土的内容，一直笼罩着悲壮苍凉乃至凄怨呜咽的声调。另外，比之前朝，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更加庞大，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是以于作品中，也呈现出更浓厚的雅儒细密色彩。总上述者，这个时期共计列选四种，即：《唐宋诗